

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经验视角的反思与重构

李新廷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358)

摘要: 政治发展理论自产生至今一直是比较政治学中的显学,但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衰败,有必要重新检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知识论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缘起于现代化理论,深化于民主化范式,但忽视了后发展国家国家建构的复杂性;从方法论来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源于行为主义革命,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进一步建立了普世解释与比较的模型,却缺乏比较历史的视野;从逻辑论来讲,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朝向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分析,显现了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从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后发展国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为反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视角,因而必须从知识论上重视制度与价值建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从方法论上采取比较历史分析来重构政治发展理论,并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关键词: 政治发展;民主化;现代化;结构功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2-0117-09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是大变革的时代,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新兴国家开始崛起。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转向第三世界国家,从欧美研究转向后发展国家研究。新兴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发展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前沿领域。政治发展理论由此兴起,研究主题涉及政治发展的过程、模式、秩序、民主化等。政治发展理论的勃兴得益于后发展国家独立后的政治转型。然而,这一过程却较为曲折,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政变、威权主义的兴起,还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涌现之后的“民主回潮”,众多后发展国家与地区的转型并不顺利。即便曾较顺利地实现转型的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也开始遭遇政治发展的危机和衰败。“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1]危机的显露带来了不断蔓延的政治焦虑症。放眼全球,为什么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会出现政治发展的危机?其根源何在?为什么中

国能够保持政治稳定与良好的治理绩效?其经验何在?

这需要重新反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后发展国家的视角就会发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主题、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与社会中心主义政治逻辑等皆是西方抽象化的产物。而后发展国家有着复杂的历史与国情,单纯输入西方理论往往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淖。“同时代性”和“同地域性”的后发展国家的经历及其问题较为相似,尤其是挑战西方普世观念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也是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和汲取的资源。因而,以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经验的视角批判性地反思与重构比较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有助于后发展国家更好地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治理。

二、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主题的知识论审视与反思

学界对政治发展概念并未达成一致,一方面源于其内涵的复杂与含糊性,另一方面因其与现代化这个

收稿日期: 2017-09-27; 修回日期: 2017-12-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国家治理的架构、政策与行动的三维融合机制研究”(17YJC810001)

作者简介: 李新廷(1987—),男,山东莒南人,政治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

概念纠葛在一起。派伊曾梳理了政治发展的十个面向,将现代化囊括在政治发展概念之中^[2],较具代表性。因此,本文对政治发展采取宏观解读的方法,将主题聚焦于现代化与民主化,从知识论上加以审视与反思。

(一) 现代化: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缘起

政治发展理论的形成得益于发展主义。“发展主义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研究途径:伴随着一群新的后殖民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比较政治学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并努力创造出一种模式来帮助我们理解它们的政治演化,这种途径与模式被称为发展主义。”^[3]因而,发展主义是有目的论指向的,即挥别传统朝向现代化的发展。发展主义源于两个面向:一是后发展国家的现实实践和经验观察;二是发达国家的现实成就和哲学反思。前者探索后发展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后者总结发达国家实现现代性的道路、环境、模式与理论。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学者建构理论的冲动源于后发展国家的落后现实。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由现代化发端,源于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面临着摆脱贫困与欠发达的首要问题。且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发达国家受此激励,投入金钱和人力加以研究,吸引了大批比较政治学者投入到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研究中。另一方面,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技术与经济的变革,更是一场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可追溯至启蒙思想以及马克思与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其核心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社会、价值等各方面的改变,人类理性的启蒙与全面扩展最终导致政治上的转型,政治发展及其现代性特征是理性化的产物。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注意到现代化并不仅仅来源于工业革命,而是受到更早时期的城市“公社”运动形成的市民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这塑造了资产阶级这一现代化变革的主体,其对资本的追求导致了全方位的变革。而韦伯以新教伦理揭示资本主义精神内在的近代理性主义特质,这带来了世界图像的理性化,人类按照目的理性改变了传统社会从而进入到现代社会。所以,现代化自然而然成为了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

总的来看,现代化理论秉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认为经济发展带来政治变迁,涉及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公民参与的扩大等方面。西方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变革带来的现代性已经展露在世界面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总结也整装待发,为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二) 民主化: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深化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利普赛特系统地建构了

一个可以验证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相关性的理论命题,即“经济发展带来民主”。“利普赛特命题”是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进行经验对比的结果,“数据显示,在更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准要高得多”^[4]。然而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现实关系却是复杂的:一方面,民主化与现代化要求的社会条件是一致的。现代化理论将民主化视为核心,寻找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民主化理论也认为只要社会条件具备,民主转型水到渠成。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相关性不断遭受批判,民主化开始从现代化理论中剥离,成为了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从而使比较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的研究从现代化转移到民主化。

作为单独议题的民主化研究在延续对社会条件重视的基础上,不再关注整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因为现代化理论以庞杂与分散的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难以进行精确对比,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现代化理论聚焦于可精确对比的社会条件。而民主化注重于以政治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化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民主化范式关注民主与独裁的二元对立。此外,民主化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单独议题还由于现实实践证伪了“利普赛特命题”。共产主义国家的崛起,后发展地区连番的军事政变,威权主义、统合主义的兴起,都推翻了“经济发展带来民主”的假设。此后政治发展转而关注民主为何不能持续的问题,开始讨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国家能力、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等问题。然而,不论追求民主还是追求政治秩序,都是基于对民主的渴望或回避而产生的。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涌起,民主化问题再次成为政治发展关注的重心。

这一转变是三波民主化浪潮实践与理论总结的结果。立足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熊彼特从程序角度界定了民主,以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在此基础上,达尔从操作化的角度将民主理论经验化。萨托利进一步将民主自由主义化,认为民主是建立在西方法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力分立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自由民主话语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并以此区分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自由民主范式与话语逐渐流行,民主转型学与民主巩固学等民主化的相关理论相继产生并产生持续影响。所以,民主化理论是政治发展理论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深化,也是比较政治学中最活跃的领域。

(三) 现代化与民主化之批判

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政治发展理论从关注现代化到聚焦民主化,并试图用西方的经验与道路来

指引后发展国家，这忽略了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国情，遭到猛烈的批判。Bates 就指出现代化理论遭遇失败后，“农民起义颠覆的不仅是政府而且是知识传统”^[5]。

首先，西方内部展开了对现代化与民主化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现代化与民主化理论内含特定的思考框架：一是西方最先实现现代化，那么后发展国家只能根据西方的标准被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注定要走从传统到现代、从非民主到民主的发展道路；二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目标是确定的，后发展的道路注定是单一线性轨迹的前进。这是西方经验绝对化和约化论的产物。以此为代表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重视多样性与历史演进的比较历史分析学派和强调政治稳定与制度化的亨廷顿的批判。

其次，以拉美后发展国家为视角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拉美国家基于发展的危机开始反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并产生了依附论。依附论是一种激进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是“试图突破‘发展危机’恶性循环”^[6]的产物。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上，依附论批判西方所谓的发展实质上是对非西方的剥削。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依附于西方国家，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控制，从而处于从属和被剥削的依附地位。“与世界体系理论最直接联系的思想学派是依附方法，实际上世界体系理论是它的自然结果，许多先前的依附论者都认同了世界体系理论。”^[7]世界体系理论在依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来分析中心的西方国家与边缘的后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二者都试图撕裂西方所谓发展的骗局和伪装，为解释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分析模式。

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理论遭受批判之后，政治发展理论转而在国家能力、公民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部分区域经济增长奇迹之后，现代化与民主化理论又重新回归。学者们重新提出“发展——制度安排——民主”的命题，从本质上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内容仍是正确的^[8]。亨廷顿关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判断也成为了现代化理论回归的证明。总而言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现代化和民主化来展开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实际上并未真正解释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问题。

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挑战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从知识论看，中国经验恰恰是对西方现代化与民主化的最大挑战。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保持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国家能力的提升，并重视传统文化的

现代性转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从这一后发展的经验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刚刚获得独立的后发展国家，在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所面临的政治发展问题是独特的。其首要的问题不是走向西式现代化与民主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独立地进行国家建构的问题，即完整的制度体系建构与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问题，以及其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国家建构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价值理论来支撑的问题。反观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则用西方现代化转型的道路来指引后发展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民主转型，这引发了后发展国家政治转型的失序与衰败问题。

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根源及其反思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论需要反思，其背后的方法论更需反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走向目的论、二分法和线性发展观，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为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所导致的。

（一）政治学行为主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形成的方法之源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源于新兴国家现实实践的理论需求，也源于政治学行为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带来的“范式跃迁”与“方法革命”。现实实践与方法革命的配合使政治发展理论一产生就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前沿领域。有学者专门指出政治发展是“区域研究和行为主义革命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9]；利普赛特对现代化理论的凝练也是从“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展开的^[4]；陈明明从元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发展研究兴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行为主义革命，奠基于科学方法论原则之上的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分析模式就无从谈起”^[10]。

行为主义之所以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方法之源，就在于政治学行为主义是一场政治学的革命。旧制度主义强调研究正式的宪法结构，这一静态的研究过程和范围限制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其国家概念的含混不利于新兴后发展国家在结构、体系方面的比较。“阿尔蒙德和其他比较研究学者在 50 年代后期令人信服地指出国家的观念长期以来受许许多多观念所模糊，应当以政治系统来代替，这才适合电脑兴起时代的科学研究。”^[11]一方面，行为主义革命带来了研究对象的转变，催生了政治体系研究，使比较政治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特定的研究范围，从而使大规模

的政治体系的跨国比较、传统与现代以及民主与非民主的比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不断精细化,定量研究和过程研究使比较政治学能够在一定的条件分析的基础上描述、解释并预测政治变迁的方向。加之自然科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渗透,跨学科的研究成为趋势,这也为政治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政治发展之所以含义复杂、内容广泛,与行为主义革命带来的跨学科研究紧密相关。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关于发展、演进、文化、组织等的研究及其理论创新都充实了政治发展理论,带来了政治发展内涵与流派的多样化。

随着行为主义带来的区域研究的增多,比较政治学更加专注于现实问题的过程比较和变迁预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扩至后发展国家,研究主题包含社会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等,使结构功能分析日渐成熟。政治发展理论受此激励,演变为普世化的理论。

(二) 结构功能主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普世化的方法之源

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结构功能主义不断完善,成为政治发展理论普世化的方法根源。结构功能主义是阿尔蒙德在伊斯顿政治系统论的基础上,采用帕森斯的模式化变量去区分不同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的产物。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有一定的政治结构和功能,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是普世的。结构功能主义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有政治结构,包括那些最简单的政治体系,即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存在在复杂政治体系中包含的所有类型的政治结构。这就可以根据结构专门化的程度和形式进行比较。第二,所有的政治体系执行相同的政治功能,尽管程度有所不同。第三,所有政治结构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功能的,不管其专门化程度如何,不管处于传统还是现代的历史时期。第四,文化意义上的所有政治体系都是混合体系。不论是从理性还是从传统意义上,没有全然现代的文化结构和结构,也没有全然古代的文化结构和结构^[12]。显而易见,这四个特征是普世化的。基于此,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阿尔蒙德之所以将政治系统进一步区分为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从方法上是行为主义对大规模精细比较要求的结果。因为在行为主义看来,系统是社会的抽象,而社会是系统性的存在,是可以进行精细比较的。另一方面从现实上讲,不论是现代化还是民主化的转变都涉及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只要观察所有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就可进行

比较。具体来说,对不同政治体系的结构比较就要了解政治结构所发挥的功能。在此基础上,阿尔蒙德划分了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的政治结构,以及政治体系结构之间输入、转换、输出、结果和反馈五个环节,并将结构功能主义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因为不论是政治体系的层次结构还是功能,实际上都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即政治环境与政治结构之间输入输出带来的变化问题。换言之,阿尔蒙德所谓的政治发展实际上就是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发展。

归根结底,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行为主义革命激励下追求普世化解释与比较的结果。作为比较政治学中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基,结构功能主义有着宏伟的目标,即建立通用的解释模式来比较和解释具有差异性的民族国家。而结构功能主义对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这些模式化变量等基本内容的建构和运用恰恰满足了这一雄心。正如威亚尔达所言:“这种模型很可能是普世的。”^[13]而且确实是普世的。

(三) 行为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限度与缺陷

行为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政治发展理论具有重要影响。在方法驱动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下,方法本身的倾向决定了理论的本质,所以政治发展理论表现出了西化与普世化的倾向。关于行为主义的缺陷已有详细的探讨,本文主要讨论结构功能主义的限度与缺陷。

首先,结构功能主义以体系、结构、功能的概念来取代国家概念,为达到比较的目的而简化了现实的复杂性。结构功能主义中的结构不是涉及国家、社会与经济等整体性的结构,而是特指功能性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性安排。所以,这一概念的逻辑即只要后发展国家具备了结构功能主义所总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和相应的功能就会实现现代化。除此之外,结构功能主义也认为现实中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未能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假定实现现代化,根源在于未能建构合理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换言之,后发展国家必须西化才能获得成功。

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传统。后发展国家的国家建构表现出政治结构多样化、制度性安排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混合性的特点。即便是继承了殖民遗产继续沿用西方体制的后发展国家(如新加坡等国)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其制度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形似而神不似”。后发展国家在现实中出现的众多“异常型民主政体”(如博兹瓦纳)和“异常型威权政体”(如新加坡)都推翻了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一般化结构模式^[14]。因而,结构功能主义简化了现实,忽视了各国发展道

路、制度、价值的多样性，走向了西方中心主义。

其次，结构功能主义将利益集团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并持功能利益化的假设，因而国家、政党均被利益集团化。功能化、利益化意味着取消了国家、政党、利益集团背后的价值追求与偏好。所有国家的组织在追求利益方面都是一致的，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分别。“这种对国家和政党的功能化解释是一种单一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没有真实揭示出发达国家的国家和政党发展的历史。”^[15]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的迥异、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对比都使利益集团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甚至利益集团本身可能并不是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最后，结构功能主义通过模式化的方法进行跨国比较，缺乏比较历史的视野。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不是历史性的比较，而是静态结构功能的比较。没有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往往把政治转型看成是制度模仿与移植的过程，忽略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传统和文明背景。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的传统，这塑造了每个国家文明与演进路径的独特性，因而各国现代化、民主化实际上都各具自身的独特性。即便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转型中具有一般性的特点，那么这些特点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以复杂的方式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传统交融在一起。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传统无不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论及其反思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研究取向，显现出目的论的发展观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有着内在的西方哲学根源。从后发展国家的视角来看，这一发展观与政治逻辑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一）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备受争议的逻辑就是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其基本观点是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必然朝向某个或者某些终点和目标。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现代化，那么政治发展必然也会带来政治的现代化。所以，政治发展的逻辑受经济发展线性逻辑的直接影响。但这一线性发展逻辑的背后还有着更深的西方理论基础。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理性主义认为历史皆是从低到高，最终实现“至善”的线性发展过程。这一传统主流观点一直被延续下来，不论是基督教的体系论证还是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所滋生的主体哲学、人道主义与乐观主义都将复杂、多元的

历史发展视为确定的、有规律的、线性的向前演进的过程。到近现代，受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影 响，线性发展观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强势话语体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一书明确论证了这一发展观，认为不管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所有国家都不可逆地走向一条同质化道路，朝向普世的方向发展，历史将终结于普世化的自由民主制。

现代化理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发展观，认为只要社会条件具备，现代化就能实现，这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线性过程。在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观与线性发展的目的论是一致的。科尔曼批判现代化理论“忽略了发展初期制度模式的多样性，默认传统和现代两端之间的运动是必然的和直线发展的，并且有一个种族歧视性的、西方为中心的狭隘偏见”^[16]。民主化理论同样认为，只要具备民主转型的社会基础条件，政治转型的结果或者“历史终结处”必然是民主。比较政治学者威亚尔达批判了这一发展观，认为其忽略了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及其困境，其典型的体现就是这一路径是单向的或者是目的论的^[17]。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相对顺利，而绝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与地区的转型极为艰难。不论是非洲地区出现的“失败国家”，还是东亚后发展国家革命与军事政变的反复上演；不论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周而复始，还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覆灭。很多国家历尽艰辛、备尝磨难，至今仍不得现代化、民主化之门而入，乃至被归入“失败国家”之列。即便是如中国这样历经上百年曲折发展的国家，仍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更别谈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探索自身制度建设的许多后发展国家。亨廷顿等众多学者对后发展国家不同种类模式转型的总结都凸显了西方目的论线性观的狭隘性。

（二）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

不论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研究主题，还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无不显示出以社会为中心的逻辑取向。现代化和民主化重点研究实现和支撑二者的社会条件，认为只要满足相应的社会条件，现代化和民主化就可达成。而结构功能主义也聚焦于政治系统的社会环境，着重从政治系统的外部视角阐述社会条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18]。用体系、结构取代了国家概念之后，阿尔蒙德提出比较政治学应通过社会而非政府来更好地研究政治。“当我们在详细阐述公共政策时，政治体系常常成了自变量，而社会和国际环境则成了因变量。”^[19]这也阐明了政治发展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

尽管在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试图“重新发现国家”,将国家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社会冲突与再分配的重要变量和结构性要素。“国家中心主义”兴起并开始取代“社会中心主义”。然而,米格代尔基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力的研究又重回对社会强调的观点。他批判“国家中心主义”：“至少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来说,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有点像专心盯着一个老鼠夹,却对老鼠一无所知。”^[20]一国长期存在并演化的社会结构对国家仍起支配性作用。配合当时现代化理论的复兴,社会中心主义也重新回归,可见社会中心主义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思维中的支配性地位。

从根源上来说,社会中心主义反映了在西方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维及在国家社会对立下对社会的重视。社会中心主义首先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与对立,而这种二元观念起始于自由主义,可追溯至“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国家脱胎于社会,从而在理论上自觉地将国家与社会作了二元划分。在自治传统中,自发演进的社会力量的崛起需要“自然权利论”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论证。不论是洛克还是托克维尔,近代自由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围绕着英美经验中市民阶层等社会力量的主导,主张社会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利,采取的是社会本位而不是国家本位的视角。自由主义演进中形成的多元主义也认为国家不过是社会利益集团竞技的平台。

这一逻辑及其渊源典型地反映了独特性而不是普遍性,是英美独特经验的产物,所以杨光斌称其为“被掩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21]。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远不是社会逐渐成熟、社会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自发建构国家的过程。例如,在西方被视为次于制度仅起次要作用的政党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苏联与中国走的就是一条政党主导国家治理的政治发展道路。

(三) 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

现代化和民主化背后的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简化了后发展国家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曲折性,进而将现代化与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从逻辑论证角度用单一线性进化的视角将西式民主视为“历史终结处”。尤其是美国将其进一步归之为美国的现代化,也即实现美国的政治制度,西方中心主义被狭隘为“美国中心主义”。当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之后,美国重新调整目标,将现代化理论推进到民主化范式。西方重新辩解政治发展的目的,认为指标多元化的现代化理论容易遭遇挫折,所以政治发展应明确指向民主化这

一局部议题。美国化让位于美式民主,但从本质上来说,主题的转移并未改变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

而使现代化与民主化走向社会中心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因为简化现实、忽略文化与传统、抽象了政治结构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结构功能模型完全排除历史与文明的视野,忽视后发展国家自身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将西方的结构与功能奉为可以普遍效仿的模板。结构功能主义的这一倾向再加上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所隐含的“种族歧视性的,西方为中心的狭隘偏见”皆表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方法与逻辑上都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

尽管现代化、结构功能主义等宏大理论失败之后,政治发展理论转而研究中观层面的具体制度,但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概念与议题的设定仍由西方主导,对具体制度的认识也建立在西方现有的实践基础之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更多着眼于总结西方成功的要素有哪些,而非西方国家缺少什么样的要素。从这一观点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尤为突出。

政治发展理论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源于西方中心论式的普遍主义与帝国主义理论。西方从自身经验与理论传统出发,认为某些价值与追求是普遍有效的,尤其认为现代化与民主化是普遍有意义的。但西方的普遍主义仅仅是西方的立场,而非全球的立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恰恰说明了西方的独特性而非普遍性,为后发展国家的自身道路做了理论论证和经验观察。而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替代品”——全球化理论进一步作了论证,认为西方中心主义建立在西方有能力支配全球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霸权的基础上。西方自认为有能力成为全球发展的标准。但随着后发展国家的崛起及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后发展国家基于自身传统与资源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了不同的民主制度形式。西方并不构成普遍模式,通向现代化与民主化还有很多其他路径。

五、比较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理论的重构：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经验的视角

政治发展理论本是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但不论是研究范式、方法还是逻辑却都是西方设定的,从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依附论是后发展国家重构政治发展理论的一次尝试。立足后发展国家的视角,他们有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但从根本上来说,依附

论者并未脱离西方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他们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关注本质上仍是目的论导向的发展主义，只不过依附论将发展的障碍归结为外部因素，即发达国家的剥削。因而，依附论未能深入各国的独特特点和现实问题找到自身发展的出路。此后现代化的复兴仍延续了政治发展理论原有的思维方式，背后的方法与逻辑的缺陷仍然存在。

要实现政治发展理论的重构必须把视角真正地投向后发展国家，真正用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来深入探求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当用求同法与求异法观察、比较以及解释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与经验时，又会发现后发展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区域相似性，同时每个国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建构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从而引发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而对西方普遍进化的观念与方法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因为中国基于自身特点与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却实现了现代化与民主化的道路。由此，基于后发展国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政治发展理论的重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经验表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形式、发展道路与西方存在根本性区别。而低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使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建构之路倍加艰辛，因而从知识论层面重构政治发展理论应重视包括制度体系建构与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重要性。“国家建构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22]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地直线前进，而是历经磨难。非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殖民之前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国家层面的本土制度，而殖民国家间接统治的策略破坏了原本脆弱的制度体系又未建立现代的制度体系。导致这一地区独立后的国家制度体系的建设毫无基础又无经验，“照虎画猫”学西方又不似，从而陷入“失败国家”的泥淖，经济灾难接踵而至。中东国家有着强大的伊斯兰传统，“基马尔主义”的西化尝试可能并不是伊斯兰地区现代化与民主化转型的模板。伊斯兰复兴运动仍使这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不得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门而入，现代国家制度建构停滞不前。拉美地区尽管之前建立过帝国体制，但是也遭到了殖民者的摧毁。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建构试图摆脱依附式发展，但是断裂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种族、等级制度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困境当中。

而东亚与上述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东亚多数国

家有着相对强大和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尤其是有着相对现代化的有效率的官僚体系。在受到相对短暂的殖民统治的干扰之后，东亚国家在二战后以自己的独特形式重建了国家制度体系，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挑战了西方所谓的民主普世模式。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国家的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制度格局。以党的各级组织为中心，自上而下建构了中国式的官僚组织体系、人大代表与选举制度体系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来看，中国式的民主注重实际的治理效果。因此，基于中国经验，有学者提出了区别于西方选举民主的“代表型民主”^[23]、超越自由民主的“治理民主”^[24]以及作为独特政体形式的“民主集中制”^[25]等。

政治制度的运转需要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与维持，而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则会导致国家建构的失败。非洲国家制度建构的失败根源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非洲家族式的政治、种族与地区的分裂、社会势力的强大等都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无法建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体系，更别谈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裂，种族的区分，军事政权和独裁统治，以及延续至今的民粹主义传统皆使拉美国家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也就没有统治能力去追求社会的平等与政治稳定，更别奢谈民主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民主的保障，没有国家治理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所以，中国之所以成为挑战西方模式的典范，也正是在于在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和干部选拔基础上，中国建立了有效率的官僚组织体系，有能力进行组织动员、资源汲取、社会分配与利益调节，形成了强国家的治理格局。也正是在国家制度建构和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意义上，中国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制度化和政治发展意义。

对后发展国家的经验考察显示：有的地区如非洲国家治理能力软弱，制度体系建构失败，而有的地区如东亚国家治理能力较强，形成了自身的制度体系。通过后发展的不同区域的正反对比，可以发现后发展国家都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尽管道路的曲折程度不同、制度建构形式不同，甚至有的后发展国家还未触及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门，但其背后有着共同的线索将它们连在一起，那就是包括制度建构与治理能力的国

家建构。这也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建设,从而成为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因而,重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将建构国家制度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二是重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将挖掘本土政治文化价值视为制度与能力建构的重要支撑。尽管西方最早界定了现代性的内涵,但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非西方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的西方化。”^[26]这反映了后发展国家本土文化的复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一般是在外来的示范压力下被迫走向现代化的“非自然”的进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背景下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尤其是引进西方世俗的政治文化并不适合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从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为各国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支撑,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直接拒斥了西方文化。东亚也将自身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源归之为不同于西方的本土文化。亚洲的自我肯定彰显了文化软实力对其发展道路的支撑意义。而从最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经验来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之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引。近年来中国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并试图解决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自信的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价值支撑、精神指引,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使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

因而,政治发展理论的重构也必须是在注重各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价值基础上的重构。后发展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应该在本土传统文化受到影响与转变的契机中挖掘自己的独有价值,适时地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与创造,从而再生出与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

三是立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够反思西方目的论与结构功能主义,从而为重构政治发展理论奠定方法论基石。想改变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忽略多样性、历史、各国文明、复杂性等缺陷,就必须重视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重视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并通过比较不同文明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的案例来分析政治发展的动态变化可以发现不同区域与国家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这一方法开始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并与结构功能主义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会关注到不同案例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探寻特定条件下复杂性的成因,具有问题导向。②比较历史分析重视时序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解释。每个国家政治发展路径的不同,在比较历史分析看来,都与发展的时机、事件的顺序、关键节点以及路径依赖等密切相关。比较历史分析运用过程追踪的方法来解释不同要素的结合带来的不同发展模式。③比较历史分析要求深入了解每个案例的历史背景与传统,从而在比较中达到经验与理论对话的目的,而且历史背景与传统对每个国家自身的国家建构都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正是上述特点使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避免陷入宏大的结构与化约分析,而将后发展国家的历史背景、真正的发展问题、发展的要素与因果关系揭示出来,能够从方法论意义上重新调整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论和逻辑论,从而重构政治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 [1]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 [2] 鲁恂·W·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M]. 任晓,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47-65.
- [3] 霍华德·威亚尔达. 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M]. 李培元,译. 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260.
- [4]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1): 69-105.
- [5] Robert H. Bates. Agrarian politics[C]//Myron Weiner, Samuel P. Huntington.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160.
- [6]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M]. 高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
- [7] Thomas R.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15.
- [8]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2(35): 450-499.
- [9] 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 储复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9.
- [10] 陈明明. 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122-128.
- [11] R·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 高钰,潘世强,译.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
- [12] Gabriel A. Almond &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 developing area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11.
- [13] 霍华德·威亚尔达. 比较政治学导论: 概念与过程[M]. 娄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7.
- [14] 郝诗楠, 王子帅. “异常民主政体”及其意义: 以博茨瓦纳为例[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3): 81-93.
- [15] 张飞岸. 美国比较政治学具有国家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11-2(007).
- [16]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Palombara, Lucian W. Pye, Sidney Verba, & Myron Wein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74.
- [17] Howard J. Wiard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Nations—Is There Still a Third World? [M]. Tomas Learning, 2004: 110.
- [18] 李新廷. 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关照[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2): 20-31.
- [19]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霖,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序言 3-4.
- [20]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xvi.
- [21] 杨光斌. 被遮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检视[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1): 1-12.
- [22]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黄胜强, 徐铭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序言 1.
- [23] 王绍光. 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J]. 开放时代, 2014(2): 152-174.
- [24] 杨光斌. 越自由民主: “治理民主”通论[J]. 国外社会科学, 2013(4): 9-18.
- [25] 杨光斌, 乔哲青. 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J]. 政治学研究, 2015(6): 3-19.
- [2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70-71.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s of post-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hina

LI Xint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has been prominent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its birth, but the recent declin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needs to reexamine the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epistemology, the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originates from 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and is deepened in the paradigm of democratization, but neglects the complexity of state building of the post-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originates from the behaviorism revolution, while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further establishes the universal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lacking a relatively historical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 theory,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hows the teleological linear development view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social centralism, thus falling in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entralism". The experi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ost-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hina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the refle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So,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system and value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abi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view of epistemology, adopt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to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modernization;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western centralism

[编辑: 胡兴华]